

文化自觉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刘国强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 中国香港)

摘要: 本文承继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诸先生的文化反省、文化自觉之理路, 认为当代中国问题, 以至世界问题, 皆根本上是一文化问题。对文化之本质、文化之基础作出哲学之反省, 一方面指出文化的基础在于能自觉价值的心灵, 另一方面指出中华民族之复兴在于自觉自己文化的恒久价值及其不足之所在, 进而长善救失。认为中华民族之复兴, 必须是民族与文化双足并立的复兴。

关键词: 文化反省; 文化自觉; 民族复兴; 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本文之目的

自十九世纪中叶, 西方文化入侵, 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挟其近代科技文明的船坚炮利下, 无法抵挡, 由自强运动张之洞之「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到五四时代陈独秀、吴虞等打倒「孔家店」, 其后胡适、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论」¹, 中国传统文化节节败退, 而在现实的政治军事上, 则是屡战屡败, 割地赔款, 以至中国濒临遭西方列强瓜分的局面。面对危急存亡之秋, 要求自强以「救国保种」的心态下, 对中国文化之反省与及对中西文化问题的探究, 成为知识分子最关心的课题。由梁漱溟先生 1922 年出版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肇始对文化的系统和整体反省, 以自觉中西印三种文化之特性, 及至当代儒者²如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诸先生, 仍继续此一文化反省、文化自觉之路。当代中国问题, 以至世界问题, 皆根本上是一文化问题。本文是上承此一理路, 对文化之本质、文化之基础作出哲学之反省, 一方指出文化的基础在于能自觉价值的心灵, 即一切文化的产生皆源于人对价值的自觉; 一方顺着当代儒家对中国文化特质为重德重人文, 而智心发展不足之看法, 指出中华民族之复兴在于自觉自己文化的恒久价值及其不足之所在, 进而长善救失。故中华民族之复兴, 其核心之处仍不离文化之反省, 文化之自觉与文化的复兴。

1、「文化」一词之字源意义与定义

也由于文化无所不在, 如此包罗广泛, 也因此每人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现象来说文化, 使得文化的反省与文化的自觉显得不容易。正如罗洛维(Lawrence Lowell)所说:「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别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它无处不在。」³ 因此要讨论文化问题, 讨论文化的反省与自觉时, 所用「文化」一词的涵义也显得广泛而复杂。著名文化学者卫威廉(Raymond William)也说过:「『文化』是英文中最复杂的两三个字里的其中一个。」⁴ 马史密斯(Mark J.

Smith)也指出：「文化是一个重要而却又难以捉摸，以至引起混乱的概念。」⁵ 什么是文化呢？中国近百年来知识分子，对文化的问题，如中国文化的特质，中西文化比较有不少讨论，但就文化自身作反省的讨论则不多。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⁶ 可以说是其中的凤毛麟角。

纵然如此，我们也先从「文化」一词的字源意义(Etymological)来考察，以帮助对文化反省，了解文化的意义。

虽然中国古代已有「文化」一词（下文再及），当代中文「文化」一词之用法，是源自西方，是十九世纪末通过日文转译而来的西方概念。

「文化」在英文，法文中同为 'Culture' 一字，德文则为 'Kultur'，从「字源学」(Etymology)的角度看，'Culture'、'Kultur' 皆来自拉丁文 'cultura'，涵有耕种，养畜，培养之意义，现代英、法、德文中都还保留了拉丁文的原来意含，在 18 世纪末，引申为人类心灵的培养而成为代表一人群整体生活方式的精神。⁷

与 'culture' 一词相近，为 'civilization'，源自拉丁文 'civis'，原意指市民之事，与社会法律政治相关。在欧洲主流语言用法上，'culture' 与 'civilization' 被视为同义。惟在德文 'Kultur' 一词，特重精神之意义，以至与特重社会政治事务之 'civilization' 一词有所分别而相对立。⁸ 'civilization' 中文为「文明」，在中文的用法上，大部份时候「文化」与「文明」通用。

中国古代已有「文化」一词，《易传·贲卦》彖辞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中的「人文化成」即是文化之意，故文化包涵人文之意义。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中也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中「文化」与「武力」相对而言，故文化亦涵文治教化之意义。「文」，古代意指玉之纹理言，引伸言之，「人文」，即人之纹理，「人文化成」，即化成人之为人之理。

西方学术的潮流，探讨问题时，往往着重对相关重要字词的定義，由希腊柏拉图开始已是如此。讨论问题由定义重要字词开始，以确定重要字词准确意义，固对反省问题讨论问题有一定帮助，然而很多时候，不少重要问题的核心字词也不易定义清楚，正如上文所述「文化」一词包涵广泛而复杂。1952年，美国人类学者克鲁伯(A. L. Kroeber) 与克罗孔(Clyde Kluckhohn) 在其著作《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检讨》(“*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中，已罗列出从 1871 年到 1951 年八十年间，一百六十四个关于文化的定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进路，对「文化」即有不全相同的理解，便有不同的定义说明。⁹ 若今日再统计罗列，包括中国学者的定义，恐怕一定不少于二百个定义。

「文化」一词经过近代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意义变得非常广泛，包括人类生活的所有活动及其成果。以下节选数个涵盖意义较广泛之定义，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化」意义之梗概。

人类学之父泰勒(E. B. Tylor) 在 1871 年发表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 一书中，把「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是一复合的全体。这复合的全体包括知识、信

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任何其它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¹⁰ 蒲斯(Bose N.K.) 在其《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Calcutta, 1929*) 中，定义文化为「人的生命活动的结晶」。¹¹ 希士高域 (Herskovits M. J.) 在其著作《人及人的》*Man and His Works (New York 1948)* 中定义「文化」为「基本是用以描述任何人群生活方式留下的整体信仰、行为、知识、禁忌、价值，与目的的构造。」¹² 蒲加特斯(Bogardus)定义文化「是一个社会过去与现在怎样动作和怎样思想的全部总和」。¹³ 克罗孔(Kluckhohn) 和奇利(Kelly) 定义文化为:「文化是一整个丛结。这一丛结包含器物、信仰、习惯以及被这些惯行所决定的人的活动之一切产品。」¹⁴ 钱穆先生定义文化「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¹⁵。这些定义都说明了「文化」所包涵意义之广泛。

克鲁伯(A. L. Kroeber) 和克罗孔(Clyde Kluckhohn) 所罗列的定义，大多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从事实立言。固可以像殷海光般将其罗列的重要定义再归纳，然后综合推论出了解文化的六个原则：

- i)文化全部实有之中，任何一层面或要件或事物，无不是文化的部份，包括「好的」与「不好的」部份。
- ii)文化包括层进中各层，不能将「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截然划分。
- iii)文化所指不限于所谓「文明人」，所谓「野蛮人」同样有文化。
- iv)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在变动之中；
- vi)价值观念是文化构成的必要条件。
- v)文化与文化价值都是相对的，虽然也有普同部份。¹⁶

也可以像曾斯(Chris Jenks) 在述过「文化」的一些沿用后，利用一四面面向的类型学(a four-fold typology) 来归纳「文化」的意义：

- i)文化为认知范畴；
- ii)文化为一涵盖和集体的范畴；
- iii)文化为一描述的和具体的范畴；
- iv)文化为一社会范畴。¹⁷

殷海之和 Jenks 的归纳，无疑可以进一步增加我们对什么是文化的了解。

2、文化存在的基础在自觉之心灵

上述的归纳，固可给文化的反省与了解有所帮助。然本文对文化之反省，不单限于事实的、社会的、与及知识的层面来看文化，亦即不从文化在现实上的各种形态、特质，和包含之内容，而是对文化产生之可能作一更根本的或哲学的探究，亦即要问：文化如何可能？或即问：为什么有文化？文化的存在有没有一个基础？如果有，基础在哪里？本文的答复是文

化的基础在自觉的心灵。我们要对文化的现象，文化的事实，文化的本质作反省，而能反省之「能」——即心灵的自觉，正正是文化存在的根据或基础，用常识的话说，文化由自觉心灵产生。

不乏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指出，人类与其它动物不同在于人有文化，而文化并不是由生物遗传来传递。如雅各布斯(Jacobs) 和史特恩 (Stern)说：

人之所以异于其它动物，是因人有文化。文化是社会遗产，不是由生物遗传方式经质细胞遗传下来，而是藉独立于遗传方式传递下来。¹⁸

克鲁伯(Kroeber)也说：文化是人类所特有者，别的动物没有文化；文化是人类在宇宙间特有的性质。¹⁹

自觉的心灵，是正如孟子所言的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亦是荀子所言的知义之心——即其所言的「人有气有生有知，而且有义。」²⁰ 也如唐君毅先生，在其《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书中说明的：

人类一切文化活动，皆为道德自我（或即理性自我，超越自我，精神自我）之表现，即道德自我为体，文化活动为用。²¹

文化非自然现象，亦非单纯之心理现象或社会现象。……吾人之意，是视文化现象在根本上乃精神现象，文化即人之精神活动之表现或创造。人之精神活动，自亦可说是人之一心理活动。然吾人所谓精神活动，乃为一自觉的理想或目的所领导者。亦即为自觉的求实现理想或目的之活动。²²

钱穆先生在其〈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一文中也指出：

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却是同一个实质。

有了心灵，才又产生了历史。

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²³

也就是说，民族文化与历史之根源在其心灵与心灵所表现的精神。

在儒家看来，文化之基础或根源在于人的自觉心灵，此自觉心灵同时是价值意识之本源。文化的活动与文化形成即在心灵对价值自觉中产生。此自觉心灵也即仁心，或称为仁义之心，良知，道德心，道德理性，超越自我。此不同的名称也是儒者响应世间，方便说法而来。

一种文化现象，如果只是一时的偶然出现或一时之流行，及后没有自觉的心灵继续肯定其价值，此种流行或时髦现象，也会像昙花一现或经历短时期后便会在人类历史文化中消失。如某种文化现象，如女性中心母系社会，以至男性中心父系社会（虽然男性中心仍是不少现存人类社会的事实），又如封建制、君主制，其相对于一段时间的历史中为有价值，而被心灵自觉的肯定，于是在历史中出现，但事过境迁，环境与人类面对问题变迁了，因此也会为后继之自觉心灵所否定，以其没有价值而不能继续存在。从心灵的角度看，也可以说心灵体

验到自觉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价值，而放弃较偏狭、较限制之价值。因此批评文化之「好」与「不好」，「有价值」与「无价值」，一方面不能只从单一角度而论，也要从其在历史中出现时之角度看，当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从人类普遍理性要求之角度来看，这也是自觉的心灵或理性的的心灵所必然有的要求。能持续久远的，必然是人类心灵在普遍理性下所自觉到的价值，此种价值将是更恒常，纵使一时间或一阶段受到质疑，但将仍不断有心灵重新自觉其价值，使其再发光芒。

心灵对价值的自觉也可以因人的欲望偏见私利，而有个人的狭隘的价值追求活动，此种活动广义地说也是人的文化活动，或如论者所说的「坏的」「不好的」文化活动，此种文化活动可以是违背主流文化或大传统的文化，而与之相矛盾。若从狭义地说文化，「文化」是指具有教养，品格与文学修养的素质，人们便不愿意称一些源于欲望的，粗鄙的，自私的价值为有文化的表现。

因此文化的自觉，应包括一方面对历史上出现之观念、制度、人物、事件或各种现象的反省，以自觉其相对价值，另一方面是反省其是否具有普遍价值以符合新时代新环境的要求。

中华文化之复兴即需要有继起不断的心灵，去重新自觉此文化中之恒常普遍价值，才可使此文化得以「子子孙孙永保」。

3、中国文化独特性与价值之自觉及民族复兴

钱穆先生尝言：

由民族产生出文化，但亦由文化来陶铸了民族。没有中国民族，便没有中国文化；但亦可说没有中国文化，也就没有了此下的中国人。²⁴

而中国文化，则是中国人或是中国民族经过了四五千年长时期变化蕴积而到今天之所成。又说：

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但也可说中国文化又创造了中国人。²⁵

「文化」与「民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²⁶

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中华文化²⁷是分不开的。脱离中华文化，也就没有所谓中华民族，中国亦不成其为中国。事实上在中国过去的传统是重文化多于重国家重民族²⁸，华夷之辨也就是以文化作划分。孔子说过：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

孟子也说过：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

故中国历来士大夫知识分子，每自傲于华夏文化之较周边民族文化高出许多，以重文化融合以成民族，而不以血统论民族，所谓「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于诸夏，则诸夏之。」，所以中华民族一方由黄帝周公孔孟所确立之文化形态所陶育而成，一方中华民族是在不断吸收与扩大，丰富着中华文化之内容，以融合成一更大的民族，不像欧洲分裂成诸多

民族国家。

然而，清末西方文化挟其科技文明的船坚炮利，使亚洲古老文明无法抵挡，中国、印度、日本、东南亚诸国，逐一被殖民化。为了自强图存，便不得不重新对自己的文化作反省。由初时自强运动曾国藩张之洞等知识分子，视中国器物之不如人，到五四时全面否定传统，要求「全盘西化」，视中国不祇器物，制度，教育，政治不如人，甚至所孕育的中国人的人格精神皆不如西方，鲁迅笔下的「阿 Q」正是这种人格缺陷的集中表现，及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等先生之重新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有其永恒价值在，他们不同于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如刘师培等之捍卫名教，而是从哲学的深层反省，以及生命之亲切体悟，以论传统文化有其不可磨灭之价值在。梁漱溟先生 1922 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对中国西方印度的文化作出反省，概括西方文化形态是向前的，印度文化是向后的，中国文化是持中而早熟的。虽然今日看来，可嫌粗疏²⁹，但当时是起着对文化全面深入反省与文化比较的先河作用。

钱穆于 1949 年 10 月在香港创办亚洲文商书院，1950 年 3 月改组为新亚书院，创校始，唐君毅先生一直参与其中。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徐复观先生，后来也到了新亚任教，使新亚书院俨然成为当代儒学之大本营。

徐复观先生主编《民主评论》，王道先生主编《人生杂志》，钱唐等先生不少反省中国文化、比较中西文化的文章，都在这两杂志中刊出，这是当代儒家在香港继承与延续梁漱溟先生的文化反省。1958 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四位儒者联名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³⁰，代表了当代新儒家对中华文化反省的一个结论。这一宣言是唐君毅先生草拟的，当时牟先生徐先生在台湾，张君勱先生在美国，经过多次书信往来，修订草拟，然后发表。

宣言中所显示对中华文化反省的结论是：文化的中心在思想哲学，了解文化的正确途径应是先把握核心的思想观念。中国文化是一元的³¹，即各文化领域如道德、宗教、政治、文学、艺术等，皆围绕着一些核心观念而展开。中国文化重仁，重道德，相较于西方文化之重智不同，儒家心性之学，「天人合一」之见，皆为中国文化义理之核心。《宣言》中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近代之民主制度与科学，是中国文化的缺点，但同时强调，中国文化并不反科学，也是有民主的种子。中国人过去在重利用厚生而产生之科技，实不逊色，儒家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等观念，皆与民主的平等精神，并没有基本矛盾冲突。民主与科学是一理智心的对列与架构表现。中国文化的发展是需要吸收民主与科学，但并不是自外添加，而是从了解中国文化精神自身未有充量发展，理智精神发展不足，故须自中国文化的生命道德主体中发展出认知主体与政治主体精神，这样才有基础，只从外袭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在文化生命精神中没有根基，也将是失败与徒然的。

《宣言》中这些观点，在唐先生和牟先生的其它著作中亦有不少的申述³²，钱穆先生则断言传统中国并非一般所说的君主专制³³，也具有一定的民主精神³⁴。他强调中国近百年没有科学，不是因为儒家思想或孔家店，而是「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不安定，科学不容易生根」³⁵。钱先生也承认中国文化「有它的短处」³⁶。因为「全世界各民族各文化体系，莫不各有轻重长短，亦莫不各有其利病得失。」³⁷

无论我们是否同意钱唐牟诸先生对中国文化特质及其优点与不足之看法，他们带出一个

讯息，就是在外袭西方器物如曾国藩张之洞之自强运动，与及外袭西方制度如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以至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袭取西方的民主共和政制³⁸，均告失败，都驱使中国知识分子对整个中国文化作出反省，以求对自家的文化，与及西方文化之特质与优劣，有更清楚知识与自觉。

陈序经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他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主张中国全盘西化，是步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对文化反省的一个尝试。在序言中指出自梁漱溟出版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已有十余年，这么长的时期内，竟没有人去写第二本」³⁹事实上，要对于整体文化的反省与自觉是不容易的，因作这样的反省，而能对整体文化有自觉，产生定见，是须牵涉到广泛之知识与学问。往后在军阀割据，日军侵华，国共内战的动荡不安的岁月中，中国知识分子要静下心来深入地对自家文化西方文化反省自觉，也更不容易。1930年代初张君勱、丁文江等由人生观引起的科玄论战，以至1960年初李敖步胡适后主张全盘西化，在台掀起的中西文化论战，并没有带来对中西文化冷静的系统的反省与疏理。新亚书院的当代儒者们从思想哲学与历史各方面的深厚学问基础上，对中华文化的反省及对其特质的自觉，应受到重视。

中国近代备受列强欺凌，这不仅是现实问题，更是文化问题。中国文化在近代未能发展高水平的科技，西方科技文明入侵中国，西方船坚炮利使中国不能抵挡；早期配戴眼镜的人被称为「二毛子」，说他们是假洋鬼子，火车传入破坏风水遭乡人反对。这些看起来是现实政治军事的问题与及人的生活问题、人际冲突的问题，可是问题的背后却深藏着文化冲突的问题。不深一层反省文化问题，便不能真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

钱唐牟早年反省与自觉中国文化的价值，以至发扬中国文化运动，是寂寞的，早期只有少数人在讲。现在中国大陆能肯定孔子，重视中华文化，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中华文化是具有凝聚力的，是两岸三地中国人统一的基础，以至是海外华人不忘寻根溯源爱念祖乡情怀之本源。（所以在外国出生受教育的第三、四代华人，这种情怀便没有了。）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这种复兴不纯是纯粹复古，而是在对中华文化之优越与不足有更真切和深入的自觉后的一种复兴，此种复兴是文化心灵，文化精神的扩充，也是民族的扩充。文化心灵文化精神之扩充，也是中华文化自身的发展。扩充不能用武力扩张来了解。罗马人武力扩张形成横跨欧亚非之帝国，却没有能形成一个扩大的罗马民族。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不能没有足以自卫、自保之武力，所以科学知识与技术绝不能放弃，但在中华文化人文精神下的武力，将永远是国际间一股正义的力量，作为制衡霸权，扶助弱小的力量。若能如此，则是科技文明与中华文化将达到一种优良的融合。

笔者以为，光肯定中华文化的价值还是不够，还须在教育上及学术上扎根，加强中华文化的基本课程⁴⁰与研究，培养新一代学人，在前辈人努力的成绩上更进一步更具体地反省与自觉自己的文化优点与不足。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要依赖于如何能培养下一代国民，一方面吸收中华文化传统中之优良素质，一方吸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份，这都是依赖于我们的教育家的视野与及所提供教育的素质。要把中华文化的优良成份与西方文化的优良成份融合，说来容易，真的落实，使融合于我们年青一代的身上，并不容易。因为文化是有机的整体，有时是难免牵一发而动全身，

有时是一文化系统里的一些价值观，长期形成了民族的一种人格轨向或行为模式⁴¹，在新时代新环境中，对解决新问题，并非相顺，甚至形成窒碍。比如受传统儒家影响的读书人，往往不屑自我标榜，本着「宿夜勤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君子耻其言过其行」、「人不知而不愠」的明训，常是易退难进，因常不屑主动自我标榜以求进，此种人格形态之自身诚可贵，但与民主政治所需的主动进取参与的人格不一定完全相顺，但不相顺并不表示相矛盾，此中便须心灵的一种自觉，即一方自觉宝贵传统所强调的真材实学，所强调的内怀忠信，也肯定应言不过其行，人不知而不愠之修养，但同时一方自觉到在现代社会扩充善，是需要客观架构，客观参与，在适当时间更需自觉地标举自信的理想与自信所具备的才能，以使理想得以客观实现。

民主肯定所有人的自由与平等，这本身也是一种道德的肯定，民主也不能违道德，但民主政治不止于道德，还须运作制度之配合。若放弃民主背后的道德价值，民主制度也可以被利用作为纯粹维护个人利益的凭借。道德与民主制度的更好结合需更多的研究与文化的自觉。

又如中国传统重人情，但人情无份际，便在政治在办事的层面上，十分讲关系，对法规制度重视不足，有法不依，成为人们所垢病。于此我们须自觉我们文化所产生的一般行为模式之偏差，而须自觉地求转变，一方面仍肯定重人情或人间有情之价值，一方特别要自觉人情关系之范围，使其受一定限制，不能私以忘公，不能因人情而造成社会的不公平。这里需要从教育与制度双管齐下培养国民一方重情义一方守法纪的素质，此中融合的细微处实仍须更多的研究。

总而言之，只有通过教育，通过学术研究，更自觉自己文化之优越与缺失，也通过教育与学术，促进文化综合与发展，也将同时是民族的复兴之路。

4、对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的疑虑的一些看法

固然，对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持保留及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所根据的理由大概有三方面，一种是惧怕大陆政权利用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进行另一种新权威主义式一元文化的独裁统治。这种保留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国家重视自家文化的教育是正常而合理的，那有英国政府不重视英国文化的教育、德国政府不重视德国文化教育的道理。所以中国政府重视中国文化的教育是很正常而合理的，也是应有之义；只要在重视自己文化传统教育的同时，不去压制其它的学问、其它的文化的教育，容许对自家文化作理性的批评，同时逐步政治改革，建立民主，将更能使中国人归心，更能保持中华民族的活力。重视自己的文化教育与一元独裁并无必然的关系。若不能吸取历史教训，只是出于利用中国文化，则中国与中国人的悲哀尚未完结。

另一种怀疑是来自世界主义的观点，认为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应该有全球性全人类性的眼光，过份强调中国文化的教育，只会增加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狭窄眼光。抱持着全球性全人类的眼光的人，我们是衷心表示尊敬的。作为个人，固然可以有自由决定作一世界公民，以至决定作一他国公民——如美国公民、英国公民等，或向慕他国文化如英国文化、印度文化而决定只终身学习该种文化。但对于任何一国政府，作为一个政府，是不可以和不应该代

替群体里的每一个人作决定，跨过了群体所属之历史文化，以要求国民先作一世界公民，或先向往他国文化。此意唐先生牟先生以前亦多次说过。

唐君毅先生几十年前已指出，我们不能空头的说世界文化，而是只能在世界各种主要文化的融通基础上说建立世界文化。要讲世界文化，也要先从认识自己本国的文化开始。正若要博爱世人，也要先从爱自己的家人亲人开始，然后扩而充之，以至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也是儒家由近而远的切实主张。如果对自己的亲人也不能产生爱，而却说能博爱世人，这是不合理不可思议的。所以，重要的，其核心精神是扩而充之。若不能扩而充之，便会产生家族主义，地方主义，狭隘国家民族主义，也不能真使中华民族扩充，但这不是儒家或中华文化的基本态度或精神。事实上，中国文化从开始就是重视天下观念，故国家之观念并不强，只是近百年来因受西方列强欺凌，知识分子才意识到国家的重要，对建立富强国家要求的迫切。钱唐牟等当代儒者并非没有全人类的观点及意识到世界文化之建立的问题，只是他们谈论得比较少。对他们而言，迫切的是使更多国人恢复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对于世界文化之建立，并不是以为中国文化取代世界文化，他们只是认为中国文化将是组成世界文化的重要部分，世界文化其它部分应该包括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西方希腊的理想主义传统等。唐先生与钱穆先生、张丕介先生等创办新亚书院，宗旨既要发扬中国文化，为什么不叫做「新华书院」或「新华夏书院」，而用了「新亚」之名，就是表示新亚洲之意。唐先生亦尝提出由联合国来召开世界学术文化会议，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等⁴²。他们的眼光，当然不是狭窄的民族主义者所可比拟的。发扬中国文化并不必然就是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

第三种情况，可以说是国内外社会的普遍情况仍不利于中华文化的教育的。在中国国内，受左的思潮影响的人是看不见中国文化的价值的，而肯定的又往往是因领导人肯定而一窝蜂，感情用事而义理扎根不深，文化自觉不足，以至发扬中华文化只是为个人利益功利计算。在国外以至世界范围上说，当今时代是功利主义，实效主义与感官主义主宰的时代，当前的时代是价值偏向，只重视功利实效与感觉的价值，对中国文化中所体验之价值并不重视。中华文化精神中也非全不重视功利与实效，只是除了功利与实效之外，更重视仁、义、理等的「目的价值」。功利与实效也不是不重要，只是世界的事情就确如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若事事只讲求功利与实效，所培养成的人将是眼光短浅，事事计较，人将缺乏深度与宏大的眼光，表面看起来像很有能力，但却单向片面，变得「目的价值」迷失，久而久之，功利与实效偏向心态将导致整体失效，或整体崩溃。中华文化教育的内涵固然是广泛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意义，可以说是性情之教，这种教育并不是可以使人立刻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或能够加速一种具体生产，而是在人之素质中建立根基，是为整体人民与民族中种下深厚基础，是一种无用之用，但其用则可谓大矣：可使这个民族代代有贤人才人出，也可使种族相融而形成更大的民族；可使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怀有深情；可使人公而忘私、为人类的福祉而努力。

科教兴国，加上民主建国，肯定是中国正确的前路。不发展科学没有民主中国难以兴盛，但教育上只重科学教育还是不够的，必须辅以中华文化人文之教育，才可双足并立，才能真使国家兴盛。唐君毅先生也说过中华民族之复兴，必须是民族与文化双足并立的复兴⁴³。这也是本文之结论。

Culture Consciousness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u Guo Qiang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T. Hong Kong)

Abstract: The article succeeds the ideas of culture reflection and culture consciousness of Qian Mu, Tang Jun Xi and Mou Zong San and thinks that the questions from modern China to the world is just a ultimate question of culture. This paper wants to reflect philosophically the culture essence and culture bases by both indicates the culture bases as mind ability to value consciousness and points out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as its consciousness of forever value、 shortcomings and consequently correct and develop. In conclusion, the paper thinks Chinese renaissance is necessarily the renaissance both nation and culture.

Key words: culture reflection; culture conscious; national renaissance; culture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03-05-06

作者简介: 刘国强, 男,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学术委员.

¹ 见张岱年、程宜山著,《中国文化欲文化论争》[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页 352。

² 此处用「当代当代儒者」一词, 避免用「新儒家」一詞, 因据余英时先生〈錢穆與新儒家〉(余英时,《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台北: 三民, 民 80[1991], 頁 31-98)一文中所論, 錢穆先生不自認為是新儒家。「當代儒者」一詞涵義較廣。錢、唐、牟三位之思想固亦有不盡相同之處, 然就其對由中國文化之反省與自覺, 了解中國文化重德重人文重天人合一之核心價值, 然後對自己文化重拾信心, 發揮優厚潛力, 以吸收西方文化之長, 使中華民族得以復興, 觀點是一致的。

³ A.L. Kaeober & Clyde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2, reprinted 1963, p.7 footnote 5. 中文翻譯取自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 香港: 文星書局, 上冊, 頁 28。

⁴ "Culture is one of the two or three most complicated wor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Raymond William (1976), *Keyword*, London: Fontana, p.2

⁵ Mark J. Smith(2000), *Culture Reinventing the Social Sciences*,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P.4

⁶ 見《唐君毅全集》第二十卷, 台北: 學生書局。

⁷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Fontana, 1981, p.10.

⁸ Chris Jenks, *Culture*, Routledge, 1993, p.9. ; 韋政通,《中國文化概論》, 台北: 水牛, 民 80 (1991), 頁 8-9。

⁹ A.L. Kaeober & C. Kluckhohn 在書中把各種對「文化」的定義分類羅列。分為各大類型: 描述的(Descriptive)、歷史的(Historical)、規範的(Normative)、心理的(Psychological)、結構的(Structural)、發生的(Genetic)、以及不完整的定義(Incomplete Definition) (pp.81-142)

- ¹⁰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頁 31。A.L. Kaeober & C. Kluckhohn(1963 : 81)
- ¹¹ 同註 2, A.L. Kaeober & C. Kluckhohn(1963), p.81。
- ¹² A.L. Kaeober & C. Kluckhohn(1963), p.84。
- ¹³ 同註 9, 頁 32。A.L. Kaeober & C. Kluckhohn(1963), p.95。
- ¹⁴ 同註 9, 頁 35。A.L. Kaeober & C. Kluckhohn(1963), p.83。
- ¹⁵ 錢穆,《民族與文化》台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民 90(2001),頁 1。
- ¹⁶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冊,頁 43-45。
- ¹⁷ Chris Jenks(1993),*Culture*, p11-12.
- ¹⁸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頁 34。
- ¹⁹ 同上,頁 32。
- ²⁰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而且有義。」(《荀子·王制》)荀子以心能知能辨,是認知的心,但心若能知義辨義,則不能說沒有價值意義,荀子對此心之原具價值意義自覺不足。
- ²¹ 《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第一章,《唐君毅全集》,卷二十,頁。書中唐先生以道德自我、理性自我、超越自我、精神自我為等同。
- ²² 同上,頁 1-2。
- ²³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台北:東大,民 65(1976)初版,民 73(1984)三版,頁 6,頁 1,頁 7。
- ²⁴ 錢穆(1968)《中華文化十二講》,台北:素書樓,2001,頁 56。
- ²⁵ 錢穆(1976)《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中國歷史精神》,台北:東大,1984,頁 129。
- ²⁶ 錢穆(1959)《民族與文化》,台北:素書樓,2001,頁 61。
- ²⁷ 「中國文化」「中華文化」一般而言是指謂相同,梁 溟、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當代儒者,多沿用「中國文化」一詞,筆者以為中華文化一詞在今日更切合,以其不限於在中國本土,在海外華人,學者間也可實踐與推重中華文化。
- ²⁸ 可參閱錢穆先生《民族與文化》,第二編第一章「中華民族之本質」,頁 61-74。
- ²⁹ 這非只是筆者個人之意見,牟宗三先生在讚賞梁先生之餘,亦批評其「未能…再繼續前進,盡精微而致廣大。」(牟宗三,《生命的學問》,台北:三民,1972,頁 112-113。)梁 溟先生自己後來對書中所論亦不滿意,說「其中實有重大錯誤」。(梁 溟,《人心與人生》香港:三聯,1985,頁 259。
- ³⁰ 《唐君毅全集》卷四之二,《中國文化與世界》。
- ³¹ 錢穆先生也持相同觀點,錢先生說:「中國文化是一本而來的。」(《民族與文化》,頁 141)「中國文化是一本相生的,在其全體系中有一主要中心,即上述之『人文精神』(同上,頁 37)
- ³² 如唐君毅先生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人文精神之重建》,牟宗三先生的《政道與治道》、《中國文化的省察》。如唐君毅先生在《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最後三章中論中國文化之未來,說中國文化如傘之未 開,喻其道雖高明而未有 開架構,架構即為理智心運用之結果。牟宗三先生在《政道與治道》中指出,中國文化缺乏「理智的架構表現」,聖人是「盡理之綜和表現」、英雄生命的智慧則是「盡氣之綜和表現」。總括言之,即中國文化之缺點在智心表現虛弱。
- ³³ 錢穆,《中國歷史上的政治》《中國歷史精神》,頁 19-38。
- ³⁴ 錢穆,《中國的民主精神》《文化與教育》,頁 107-117。
- ³⁵ 錢穆,《民族與文化》,頁 144。
- ³⁶ 同上,頁 141。
- ³⁷ 同上,頁 35。
- ³⁸ 固然,其五權分立,亦有嘗試融合中西之處,而有所創造之意,然整體而言,是以西方民主政制的仿效。
- ³⁹ 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台北:牧童,民 66(1977)。梁先生的書於 1922 年出版,僅為十一年。
- ⁴⁰ 就筆者所知,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全國高校已開始設有選修的「中國文化概論」課程。
- ⁴¹ 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台灣著名心理學家楊國樞和人類學家李亦園等教授從傳 文化的價值觀與中國人的性格關係作過不少研究。見李亦園、楊國樞編著,《中國人的性格》,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民六十(1971)。
- ⁴² 《唐君毅全集》,卷十,頁 146, 152。
- ⁴³ 《唐君毅全集》,卷八,頁 233、259、269。